

新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是如何诞生的

□ 颜 慧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7周年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海军从当年的小木舢板到如今的舰艏巨舰，从沿岸近海到远海深蓝，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书写了辉煌壮丽的诗篇。核潜艇是一个国家大国地位的象征。1974年8月1日，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正式列入中国海军战斗序列，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这是中华民族新的骄傲，但这艘核潜艇诞生的曲折历程却鲜为人知，让我们掀开它的神秘面纱。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核潜艇是潜艇技术的重大突破，是海军迈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954年，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美国海军的“鹦鹉螺”号正式服役。随后，苏联、英国、法国等都相继有了自己的核潜艇。中国何时拥有自己的核潜艇？这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挂在心头的一件大事。

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发展国防尖端武器的战略决策。同年2月18日，彭德怀向中共中央提出要逐步研究和争取生产核武器的建议。1958年6月，二机部和海军先后提出研究导弹核潜艇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批准，随后成立了由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等4人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划和领导核潜艇的研制工作。此时，我国第一个核反应堆开始正常运转，为核潜艇的研制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于是，主管科学技术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聂荣臻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议：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即核潜艇）。这个报告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毛泽东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海军潜艇新技术问题》的通知。新中国的核潜艇研制任务正式拉开序幕，为保密起见，将这项工程取

代号“〇九”工程。由于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对核潜艇技术实行封锁，这反而激起了我国自主研制核潜艇的决心。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共中央决策下马一批工程，但仍保留了部分力量继续进行核潜艇工程研制工作。从项目的决策上马到研制成功这十几年间，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毛泽东先后做过近10次重要批示，周恩来主持了10余次中央专委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达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及时解决研制中的重大问题和技术协调工作。党的坚强领导是核潜艇研制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得以顺利完成的最大最强保证。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1965年，中共中央决定，在西南的深山中建造成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当时，没有图纸资料、没有专家权威、没有外来援助，新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研制就是在这样“三无”的基础上艰难起步的。但是，在全国的大力协同下，从26个省级行政单位的1200多个单位，调集了8000多名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以及解放军官兵。他们在“赛革命、赛团结、赛进步”的口号下，满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防作贡献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在一个毫无工业基础的深山老林中开始建立核动力研发综合基地，代号为“九〇九”。

在那个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第一代创业者们首先要克服的就是生活上的困难。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曾回忆道：“我们都是吃着窝窝头搞核潜艇，有时甚至连窝窝头都吃不饱。”生活上的困难可以咬咬牙顶过去，科研上的困难才更让人揪心。当时，我国在核潜艇建造方面的知识几乎为零——仅有几张模糊不清的外国核潜艇照片加上一个玩具模型。科研人员将玩具模型一一拆开，摸索构思核潜艇

的设计图纸。核潜艇海量的关键数据都需要计算，但当时国内极度缺乏计算工具，有限的电脑需要优先保障“两弹”工程。研制团队采用加减法用算盘、乘除法靠人拉计算尺的土办法，终于将核潜艇的关键数据准确地算出来了。为了保证核潜艇的稳定性，所有设备、上万的管线都要称重，他们采用“斤斤计较”的办法，最终将数千吨的核潜艇定重测试值与设计值相吻合。更加值得一提的是，核潜艇上全部4.6万个零部件、1300多种材料，都是我们自主研制生产的。

1969年，经过4年不分昼夜的奋战，“九〇九”主体工程终于基本完工，开始进行设备安装。核心设备是一台重达60吨的反应堆压力容器。如何将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安全运到基地、装进厂房？这无疑又是一次大的挑战。工程指挥部采取充分发动群众、集思广益的办法，通过10多辆大马力汽车牵引，如履薄冰地翻越十几公里山路后将这个大家伙安全抵运基地。最后再采用推、拉、顶、吊等方式把这个大物件“盘”进厂房。

1970年夏，核潜艇研制进入最后关头——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起堆试验。这是一个由数万台（件）设备、部件组成的非常复杂但又十分精密的系统，其质量是否过关、效能是否可靠，必须经过严格的试验才能作出结论。周恩来十分关注这个试验，并专门作出指示：“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这16字方针后来成为核潜艇研制建造的基本遵循。

新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制，严格遵循“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一步一个脚印，边研究、边设计、边试验，最终创造了中国人在世界核潜艇发展史上的速度和奇迹。被誉为“核潜艇之父”的黄旭华，从1958年研制核潜艇开始，他“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到1988年的30年间，没有回过一次老家探望双亲，直到30年后再相见，95岁的母亲与62岁的儿子对视却无语凝噎，这是那一

代科研人员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潜入深海

1970年12月26日，新中国第一艘鱼雷攻击性核潜艇下水，核潜艇进入首航试航阶段。

首航试航，意味着每次进行的项目，都是从零开始：第一次启堆、第一次出海、第一次下潜……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海军就开始从常规潜艇挑选精兵强将组建潜艇队。对于这些官兵来说，“核裂变”这种专业词汇是头一次听说。就是他们，凭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硬是啃完了核物理、高等数学、流体力学等30多门专业课程，摸清了上万台设备的脾性。他们中间的36名官兵，后来被誉为新中国核潜艇事业的“三十六棵青松”。正是以他们为骨干的第一支核潜艇艇员队，驾驶着中国人自主研制的核潜艇犁开了第一道历史航迹。

有一次，核潜艇在进行下潜试验时升降舵突然失灵，导致潜艇大纵倾，仅有3米就要撞到底底。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水手沉着冷静，果断操作，迅速排除了故障。近5000吨的核潜艇被成功拉回跳至水面。整个排除以秒计时，但凡犹豫一秒钟，核潜艇都可能触底，导致人艇两亡。在核潜艇首航试航期间，共出海26次、进行200多项试验，遇到的惊心动魄的场景有很多次，但由于保密原因从来没有向外界透露过半点。

1974年8月1日，在人民解放军成立47年之际，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正式编入海军战舰序列，被命名为“长征一号”。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满怀激情地感叹：核潜艇搞出来了，人民感谢你们。

实践证明，研制像核潜艇这样具有战略意义的“国之重器”，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集中资源优势协同攻关，就一定能够干成。



淄博市革命烈士纪念碑坐落于山东省淄博市革命烈士陵园。淄博市革命烈士陵园前身是始建于1948年的周村革命烈士陵园。1999年，经山东省政府批准，迁建于周村城区东南的大埠山上。2000年3月，周村革命烈士陵园更名为淄博市革命烈士陵园，它是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淄博市革命烈士纪念碑矗立在陵园所在的大埠山之巔，碑高19.99米，寓意建于1999年；碑身似3把利剑，象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和平建设3个时期；下面是3层大小不一的底座，象征已被推翻的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周围是3条断开的锁链，象征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斗争而挣脱的锁链。碑身正面大理石上刻有“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侧面是碑文，全文如下：

周村，以“天下第一村”名扬海内，饮誉古今。百年风雨，灾难深重，民生凋敝，长夜难明。公元一九四五年八月，首获解放，后历经三失而三得。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二日，我山东兵团第九纵队，以风卷残云之势，一举歼灭守敌，周村终获解放。直至和平建设时期，无数英雄人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欣逢盛世，人民安居乐业；饮水思源，铭记先烈伟绩。爰立此碑，以励后人。

周村区人民政府
公元二零二零年元月立

碑文概述了淄博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强敌、英勇斗争的光辉历程，缅怀了在战争中牺牲的革命英烈，歌颂了一代代革命先烈矢志不渝、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敬读碑文，承先辈之遗志，深感吾辈责任重大。

“一马三司令”。一马三司令，得了抗日病，一心打鬼子，救咱老百姓”，这是抗战时期鲁中大地上流传的一首歌谣。“一马三司令”，是指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渤海军区第六军分区副司令员马晓云和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马天民三兄弟。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淄博，先后制造了谦益祥惨案、河东惨案、铁山惨案、周村大尚庄惨案等10余起惨案，犯下了滔天罪行。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积极拥护抗日，受到山东省委高度重视，并派遣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等同志到长山中学校，筹备鲁中地区抗日武装起义。1937年12月26日，100余名抗日志士在黑铁山脚下的太平庄举行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廖容标任司令员，姚仲明任政治委员，赵明新任政治部主任。几天后，马耀南携带筹备的粮款和弹药赶到黑铁山与起义部队会合，担任临时行动委员会主任兼第五军参谋长。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拉开了鲁中地区抗日救国的大幕，与胶东天福山起义、泰安徂徕山起义并称山东抗日“三山起义”。

1938年6月，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马耀南任司令员。1939年7月22日，马耀南和杨国夫率领部队移防桓台牛旺庄时遭敌人包围，马耀南艰难突围至大寨村后壮烈牺牲。10月14日，马天民到长山县大新庄搜集枪支时，被叛徒出卖以身殉国。他的头颅被日军

鲁中大地革命牺牲的见证

——山东省淄博市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武加福

残忍地割下，悬挂在长山县城城门上达数日之久。1944年8月10日，马晓云在青城王家庄战斗中壮烈牺牲。1947年春，三烈士墓迁往周村北旺村马家空地。1961年1月，济南军区、山东省民政厅出资将三烈士墓移葬于周村革命烈士陵园。

周村三次解放。1945年8月28日，八路军对占据周村的日伪军发起进攻，周村获得第一次解放。9月，驻扎济南、青岛的拒降日军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策动下，沿胶济铁路从东西两侧向淄博进犯，相继占领了周村、张店、淄川、博山等地。1946年6月7日夜，鲁中军区第9师在渤海军区警备第7旅第15团配合下向驻扎周村的敌人发起进攻，经过一夜激战，扫清了外围敌人，但未能突破城墙。8日黄昏，第9师再次向周村之敌发起进攻，部队攻入城内，守敌弃城而逃，周村获得第二次解放。6月23日，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司令员王耀武指挥驻济南、昌潍、青岛的5个军约10万兵力，向胶济铁路沿线解放区大举进犯。7月3日，国民党军再次占领了周村。1947年2月20日至23日，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莱芜地区全歼李仙洲军团，取得莱芜战役的胜利。华东野战军乘胜北上，相继收复了博山、淄川、张店、周村等地，周村获得第三次解放。7月，国民党军集中兵力进攻鲁中解放区，周村又一次被敌人占领。

打响解放山东第一仗。1948年3月11日，许世友、谭震林率领华东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第七、第九纵队打响了胶济铁路西段战役。第七纵队率先包围张店，毙伤敌人500余名、俘虏2500余名，张店获得解放。12日凌晨，第九纵队向周村之敌发起攻击，歼灭国民党整编第32师师部、第141旅、新第36旅一部共15000余人，俘虏2名少将军官、114名校级军官，周村获得解放。张店、周村解放之后，驻守胶济铁路西段的敌人开始全线动摇。3月22日，胶济铁路西段战役胜利结束，收复张店、周村、淄川、博山、邹平、章丘、莱芜等重要城市11处，共歼敌3.8万余人。许世友把这次战役评价为“解放全山东作战计划中的第一仗”，为解放全山东并最终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中央苏区时期的“列宁室”建设

□ 张 锋

中央苏区时期，由于红军基层战士和革命群众的政治文化素质普遍亟待提高，因此在进行激烈军事斗争的同时，苏区积极探索群众性政治文化教育的新路径，列宁室就是在紧张战斗环境中发展形成的、具有鲜明革命印记和时代特色、推进苏区军民政治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

中央苏区大力鼓励和推动列宁室建设。1930年10月，我军历史上首部政治工作条例《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确立了列宁室在红军中的地位，明确由“政治指导员管理并指导列宁室及壁报工作”，列宁室的工作开展显然已成为红军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1931年12月25日的《红星报》对建立列宁室的意义进行了系统阐述，指出要在大力“发展列宁同志的工作作风和革命精神”基础上，实现“两个养成”的目标：一是养成每个红色战士成为中国革命及世界革命的列宁主义者；二是养成红色战士的活泼的生活和习惯。1934年红军总政治部在《红军中俱乐部、列宁室的组织与工作》中明确指出，建立列宁室“是发扬巩固红军战斗力必要的工作”，要求“以连为单位设立列宁室”。

在苏区党政的积极支持下，列宁室从红军逐步扩展到地方。1932年8月，湘赣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求各机关团体、军队、工厂、合作社、医院等都要组织列宁室，实现列宁室在基层组织中的全覆盖。1934年2月，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在《建设我们铁的红军》一文中强调，从提高红军战士的政治文化素质这一强烈需求出发，要把列宁室各项

工作切实建立起来。

在认真总结前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于1932年专门颁布《列宁室组织法及工作条例》，详细规定了列宁室的规章制度、组织结构和工作方法等，使其开始拥有一套系统完整的运作程序。在组织结构和内部分工上，根据1934年4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规定：原则上每一伙食单位，农村以村为单位，设立一个列宁室，“每一列宁室至少须有识字班、图书室及墙报，此外，还必须有运动场或游艺室的设备”。列宁室下设有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干事会，负责组织和管理列宁室的具体事务，“最低限度每周要召集一次会议，检阅和计划各部门的工作”。

列宁室的建设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30—1931年中央苏区创建过程中的起步初创阶段。在这一时期，列宁室作为红军队伍中的基层政治组织，开始崭露头角发挥作用。特别是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红色政权力量的大力支持下，列宁室开始从红军系统向地方系统进军，随后中央苏区各县相继建立起列宁室。

第二阶段是在1932年的快速发展阶段。由于中央苏区地域的不断发展，随着红军队伍力量的持续增强和覆盖区域的逐步巩固，为列宁室的发展创造了重要前提条件，因而这一时期苏区列宁室的数量和规模明显扩大。据统计，到1932年底仅江西省14个县就建立起了712个乡村俱乐部列宁室，这一新型载体开始成为面向苏

区群众开展红色政治文化教育活动的一种常态化模式。

第三阶段是1933—1934年间的中央苏区鼎盛阶段。随着中央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苏区进入全盛时期，与军事上的捷报颇传相呼应，列宁室的建设也达到高潮。1934年9月29日的《红色中华》报欣喜地指出：“在各种机关团体中，文化生活成了工作人员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每个组织都附属有自己的列宁室，进行群众的文化教育工作。”可以说，此时列宁室在中央苏区的各级政府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红军中的各个连级单位已实现了全覆盖，成为中央苏区革命文化的重要标志。

列宁室对红色政治文化建设发挥了突出作用，切实推动了马列主义在中央苏区的普及。作为一类目标指向极为明确的政治文化设施，列宁室通过组织各种学习活动，提高了红军基层官兵和地方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成为苏区马列主义和革命文化的重要传播渠道。其时，中央苏区大量红色报刊的编辑出版，也为列宁室提供了丰富阅读教材。1933年3月19日的苏区少共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对列宁室的活动有一段生动的描述：你看红色中华，我看青年实话，他跑来笑哈哈，列宁室真正好呀！

向广大群众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作为一个鲜活的、富含强烈政治意蕴的社会空间，列宁室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介绍和解读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各项方针政策，使党的政策话语能够及时在人民群众中得